

下午,把刚刚烘好的馅饼送去给邻居阿瑾,却发现她12岁的女儿荷荷躲在房间里哭。荷荷一向是个开朗的女孩,这一回,稚龄的她,究竟是碰上什么坎儿了?阿瑾双眉紧蹙地说:“学校有个庆祝会,要求每个学生带一样食品。荷荷蒸了个芋头糕,可老师才吃了一口,便当众喊了起来:‘哎呀,这么咸,你家是开盐场的吗?荷荷正觉尴尬时,没想到老师居然还火上添油地说道:这样咸的芋头糕,吃了是会生肾脏病的呀!’这种刻薄的揶揄,严重地伤害了荷荷的自尊心,而周遭的同学也你一句我一句地跟着损荷荷,弄得她无地自容。一回到家,她就哭得天崩地塌……”

鲜花和武器

(新加坡) 尤今

孩子心灵稚嫩如初萌的叶芽儿,是需要小心呵护的;任何具有带侮辱性的语言,都会留下终生难愈的疤痕。

我女儿就读小学六年级时,也发生类似事件,然而,很幸运的,她遇到的是一位良师。

那一年的教师节,女儿想要独立为她敬爱的级任老师烘焙一个巧克力蛋糕。不谙炊事的她,从傍晚一直忙到晚上,才把那个费尽心力烘成的蛋糕捧了出来。我一看,便跷起拇指称赞道:“哇,好漂亮啊!”她的眸子立马变得五彩缤纷,目光里荡漾着自豪;她继而把一个个小小的杯形蛋糕递给我,说:“我用剩下的食材做了这个,让您尝尝。”我高兴高兴地咬了一口,然而,仅仅一小口,我便大大地愣住了——那蛋糕,实在太、太、太甜了,那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甜,突兀地横梗在喉头,根本咽不下去,哎呀,我原

以为是惊喜,没想到是惊吓!然而,这是我女儿第一次烘焙蛋糕,我不忍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她,我不能打击她的信心;再说,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就算要重做,也来不及了。我只好心里默默地向老师道歉:“对不起啊。”

次日一早,女儿神采飞扬地捧着蛋糕到学校去了。傍晚回家,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老师一看到蛋糕,便欢喜地称赞蛋糕的造型很美,她要带回去和家人一起分享。我暗叫一声不妙,如此一来,老师全家人的味蕾都得忍受一回折磨了!然而,老师第二天却告诉女儿,蛋糕一拿回家,家人便抢着吃光了。我知道,这是老师为了保持女儿自尊而撒的一个白色的谎言。老师的仁心善意,让我心存感激。

年尾,校方要举办一个野餐会,女儿说她要烘焙巧克力蛋糕,老师微笑地说:“好呀!”下课时,她悄悄地把女儿拉到课堂外面,轻声说道:“你上回烘焙的蛋糕很好吃,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很强的健康意识,不喜欢太甜的东西,所以,当你烘蛋糕时,可否请你把糖分减半?”女儿点头如捣蒜。结果呢,她根据老师要求烘焙出来的蛋糕,甜度合宜,非常可口。

上述这位良师,把赞美和鼓励缀成美丽的花环,让学生戴上,给予他们信心;另一方面,她又把握机会教育纠正学生的错误,给予他们武器去应付真实的生活。

她让所有的老师了解了教育的真谛。



走路的云

去饭店吃饭要预订座位,这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很多人在预订饭局时还会选择所偏好的座位。

上海的饭店多极了,但每个人经常去的也就是几家。时下的饭店菜价上调,服务员短缺,对喜欢外出吃饭的人来说,去饭店

门挑选可以从高往下看开放式厨房的座位。

一段时期十分流行开放式厨房,我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干脆把厨房移到了进门的位置,厨师们个个衣着整齐、精神抖擞,熟练操作刀,其实这也是店家的推广手段。真有不少食客,特别是那些喜欢日式“铁板烧”的人,就是专挑这种靠

近开放厨房的位置。

食客对于什么是中意的座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会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异。当你兴高采烈时,希望坐在一个能够看到别人,同时别人也能够看到你的地方;当你累了,希望利用吃饭的时间休整一下,则肯定会选择光线暗一点,装饰典雅一点的角落坐下。

外出旅游,最担心的是同住搭档,倘若打呼,噪声煎熬,难以入眠。翌日,哪有心思游玩。睡眠可比吃饭更重要。

有过打鼾者干扰的遭遇,故每次与人同住,明白选择搭档,非常重要。故此,我会直截了当问对方是否打鼾?倘若打鼾,赶紧换人,“原则问题”,绝不妥协。辨别一个人是否打鼾,多少也积累了点经验:胖子者容易打鼾,上了岁数容易打鼾。两者结合,那就鼾声如雷了。但也有看走眼的个案,那次去桂林开笔会,与某报记者李兄同住,见他白皮细肉,戴副眼镜,文质彬彬,估计他不会打鼾,我俩结缘,又是老乡,我也没多问就主动与其同住。晚上就寝,先是聊天,孰料老兄须臾鼾声如雷,声震屋宇,想努力入眠,根本无门。用被子盖住脑袋,但呼噜声穿透棉被。无奈又爬起来找了手机耳机,塞在耳孔隔音,但呼噜声顽强地穿透耳机,无济于事。在如雷般的呼噜声里煎熬了两小时,实在无奈,只得悄悄爬起来,另开房间。

小时候听祖母说,打呼噜的人多是胖子,这类人中气足、身体好。想不到斯文书生亦中气十足,颇感意外。这次遭遇颠覆了过去认知。后来得知打呼噜并非中气足,而是属于一种病,系呼吸不畅所致。

过了河,就是卡普齐纳山了,这座位于萨尔茨堡城内的小山丘,本身并不起眼,却因着其丰厚的历史和特别的视角,而被曾经的王公贵族与如今的市井游客所青睐。在林茨巷的一个越发不起眼的拱廊前,我绕进了差点儿错过了的进山之口——斯特凡·茨威格路。

关于这条路,茨威格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昨日的世界》中写道:“我所居住的那座树木葱茏的小山丘,就像这座巨大山脉的最后一朵渐渐归于平静的浪花一样;汽车无法进入,只能通过一条有三个世纪历史的蜿蜒小路爬一百多级台阶才能上去……”这条路古朴清静,石阶三五成组,缓缓登上山去。踏上这条曾被茨威格走过千百遍的山路,仿佛走进了他人生中的起伏与成败、冰凉与悲欢。

茨威格的旧居建于十七世纪,最初是一个大主教狩猎时的行宫,后来被一位贵妇人买下,她两个女儿的钢琴教师正是莫扎特的姐姐南妮尔,所以,不

止南妮尔,而且莫扎特本人也曾在这所别墅进进出出。茨威格在他的书中并没有说起这一段往事,但提到了“1807年弗兰茨皇帝访问萨尔茨堡期间,曾在我们这所房子里玩过基格尔游戏,亲手把这个球推滚过长长的走廊”。

然而,这座小宫殿用茨威格的话来说却是“浪漫而不实用”,尤其在茨威格入住此处之初,正是一战刚刚结束时的大萧条时期,茨威格写道:“我们发现自己的家几乎无法居住。雨水起劲地滴进房间,每次下过雪后,走廊都会被雪水淹没……最严重的裂缝被费力地用硬纸板糊上,当新雪落下时,除了我们自己爬上屋顶及时铲除积雪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由于没有人送货,每样小东西都要自己背上山来。但最糟糕的是寒冷,方圆几里都没有煤……在贫乏之中,我们只能用泥灰自救……三个月来,我几乎完全是在床上用冻得发青的手指写文章,每次写完一页后,我都会把手指拉回被子里取暖……”

但即使是在艰难的日子里,茨威格却是笔耕不辍,据他的第一任妻子记载,茨威格在这所房子里写下的稿纸就有二十多万页,因为他在文

学上的声望与成就,再加上自1919年开始举办的萨尔茨堡国际艺术节,使这座位于德奥边境的小城在夏天的时候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艺术家和剧作家聚会的宝地,而茨威格的别墅,也是这些巨匠泰斗们喜欢造访的地方,茨威格写道:“罗曼·罗兰曾在我们家里住过,还有托马斯·曼;……霍夫曼斯塔尔……阿瑟·施尼茨勒都曾是我们友好接待过的客人;在音乐家中,有拉威尔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还有来自各方的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来过我们家呢?每一个夏天都

了。”我一听他不打鼾,心想那电子玩意似熟睡婴儿般安静,再说明天一大早就得赶来空腹抽血、做B超,便果断决定不回去了。就寝前,老傅从照相机背包里取出电子仪器,四方形,犹如过去流行的“饭盒子”录音机。他将仪器放在床边立柜上,将管子套在嘴巴和鼻子上,就像“大鼻子”防化兵。熄灯后,老兄很快去了“苏州”。虽没发出呼噜声,但那洋玩意却有节奏地发出低频率噪声“吱-咕”,犹如危重病人上了呼吸机一般,令人烦躁,更令人揪心。开始还抱有侥幸心理,用被子捂着耳朵强迫入睡,但仪器的呼噜声远比自然打鼾声刺耳恼人。

翌日早餐邂逅李兄,他抱歉地解释:“应该告诉你一下,我打鼾比较严重。”我气气地说:“是我有问题,太敏感,经受不住呼噜的考验。”

之后,与人出游,第一夜选择同住搭档,倍加小心,没再遭遇失眠的尴尬。但那次单位组织体检,再次马失前蹄,且遭遇了更残酷

选好搭档

李动

的窘况。不是我大意失荆州,纯属孤陋寡闻,跟不上科学的迅猛发展。

那天下午,同事老傅走进病房,见同室是我,笑说:“老朋友,与你住一起太好了!”老傅比我年长,身形魁梧,估计他是重量级打鼾者,分贝肯定不低。我礼节性地:“很高兴与你同住,不过我晚上不住这里。”老兄调侃我:“这么疼老婆,一晚上也舍不得啊。”我赶紧解释:“不是的,家里有点事。”

吃完晚餐,看新闻联播,彼此闲聊起来,因皆爱好看书,有种遇知音之感。海阔天空,刹不住车,一看表已近10点,赶紧起身。老兄善解人意地说:“我过去打呼噜挺厉害,现在配了一个美国的电子仪器,再也不打鼾

寻找昨日的世界

林中南

爬一百多级台阶才能上去……”这条路古朴清静,石阶三五成组,缓缓登上山去。踏上这条曾被茨威格走过千百遍的山路,仿佛走进了他人生中的起伏与成败、冰凉与悲欢。

茨威格的旧居建于十七世纪,最初是一个大主教狩猎时的行宫,后来被一位贵妇人买下,她两个女儿的钢琴教师正是莫扎特的姐姐南妮尔,所以,不



燕山腊雪飞终古, 太液春潮涌至今。 昂首峰台奔怒马, 苍峦幽壑碧云深。

柬友人 散人传韵动京畿, 去住悠然浑忘机。 一唱春深风雅遍, 四方潮合纳星稀。 清辉朝纳星辰谱, 贵姓堪轻朱紫衣。 毕竟湘湖天姥侧, 浙东山水总依依。



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而明快的精神交流的时光啊!”在那些快乐的时刻,茨威格以为他一直所梦想和倡导的欧洲大同的理想已经近在咫尺,也因为如此,他一度将他的房子称为“欧洲的别墅”。

可是,良辰美景终究未能持久,希特勒上台之后,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陷入了无尽的灾难。不仅他的书被焚烧和禁止,而且他的房子也遭到了无端的搜查。从那

一时刻起,茨威格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奥地利呆下去了。出走英国之后,1937年的秋天,他最后一次回维也纳,与自己的母亲和过去的一切告别,在再次离开故土的路上:“我的火车路过萨尔茨堡,这座我的房子所在的城市,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我甚至没有在火车站下车。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口看到我山上的房子,那座带着那么多多年所有记忆的房子,但我没有去看。何必呢?——我再也不会在这里居住了。当火车驶过边境的那一刻,我知道,就像《圣经》中的始祖罗得一

样,身后的一切都成了尘埃和灰烬,过去的一切都变成了苦涩的盐。” 春日的阳光温暖地照耀在茨威格别墅鹅黄色的外墙上,可惜因为这座建筑至今不对外人开放,所以只能透过层层灌木和铁丝网远远打量,在房子对面的卡普齐纳修道院的右侧,有一座茨威格的纪念雕像,虽然只是一个不大的头像,却令人感慨万千,他和众多的因他而来的读者和追随者一样,都进不去他曾经生活和写作的地方。

1942年,茨威格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巴西双双服毒身亡,他们没有等到自己的民族最终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的那一天,但是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他的读者,在他过世八十多年的时候,还能够踏着曾经的足迹来看看他,也应该觉得欣慰了吧。



闻铃断肠思玉环 见月伤心盼团圆 闻铃 (设色纸本) 朱刚



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而明快的精神交流的时光啊!”在那些快乐的时刻,茨威格以为他一直所梦想和倡导的欧洲大同的理想已经近在咫尺,也因为如此,他一度将他的房子称为“欧洲的别墅”。

可是,良辰美景终究未能持久,希特勒上台之后,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陷入了无尽的灾难。不仅他的书被焚烧和禁止,而且他的房子也遭到了无端的搜查。从那

一时刻起,茨威格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奥地利呆下去了。出走英国之后,1937年的秋天,他最后一次回维也纳,与自己的母亲和过去的一切告别,在再次离开故土的路上:“我的火车路过萨尔茨堡,这座我的房子所在的城市,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我甚至没有在火车站下车。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口看到我山上的房子,那座带着那么多多年所有记忆的房子,但我没有去看。何必呢?——我再也不会在这里居住了。当火车驶过边境的那一刻,我知道,就像《圣经》中的始祖罗得一

枕边人

格至

胡老板的老婆大字不识几个,一起出外旅游时,却给了我惊喜。

某一日,旅游中大巴车刚驶离宾馆,她突然尖叫着问坐在后排的丈夫,包带了没有?胡老板“啊呀”一声,连说“糟了糟了,忘带了”。一车人齐唤驾驶员,让他掉头,再回宾馆。胡老板老婆却笑眯眯地说,不必了,我知道他带着包,他是蒙我的。众人不解,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红光满面说,因为他刚才低了一下头,他就是在下意识地看包。这个瞒不过我的。

这个女人厉害,她丈夫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

去过很多地方,记忆最深的还是山村里的那一晚,请看明日专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异地首夜

责编:刘芳